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T H E A W A R E N E S S O F N A T I O N A L S U B J E C T Y



民族主体性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

大二口一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THE AWARENESS OF NATIONAL SUBJECTIVITY



民族主体性的觉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

李广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主体性的觉醒：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 / 李广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 - 7 - 5004 - 9335 - 8

I. ①民… II. ①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
中国 IV. ①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0164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63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 |
|------------------------------|---------|
| 序言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形式 | |
|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 高文新 (1) |
| | |
| 导论 哲学与哲学的想象力 | (5) |
| 一 哲学想象力:走出知识论困境的努力 | (8) |
| 二 中国哲学中的想象力元素 | (13) |
|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 | (18) |
| | |
| 第一章 “自由”与“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 | |
| 中国化的第一重想象 | (24) |
| 一 “第一重想象”的经验基础 | (25) |
| 二 一个哲学命题的提出与展开 | (49) |
| 三 “经验想象力”中的真理定格 | (68) |
|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一重想象的咏叹 | (88) |
| | |
| 第二章 先验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 |
| 中国化的第二重想象 | (90) |
| 一 “第二重想象”的先验标识 | (92) |
| 二 经验之“是”与先验之“是”的逻辑断裂 | (118) |
|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消解 | (142) |
| 四 从问题的历史走出的“历史问题” | (155) |



| | | |
|--------------------------------------|-------|-------|
| 第三章 中国当代哲学语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 | (158) |
|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构成 | | (160) |
| 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 | | (160) |
| 二 我们是否“读懂”了我们的“问题” | | (176) |
| 三 哲学的主体性追问及其时代意义 | | (189) |
| 四 由“问题”导引出的人的悟觉 | | (212) |
| 第四章 民族主体性的觉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想象力 | | (214) |
| 一 中国当代哲学挺立民族主体性的理由 | | (215) |
| 二 民族主体性的觉解 | | (232) |
|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想象力 | | (249) |
| 结语 永远的西西弗斯 | | (264) |
| 参考文献 | | (268) |
| 后记 | | (274) |



序　　言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形式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高文新

2007 年年末，在读到李广昌博士的论文初稿时，我就有一种感觉，这不是只有书本知识的年轻博士那种生硬的毕业论文，而是经过多年研究和积累，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演进有深刻的体会，一个比较成熟的中年学者的艰辛之作。经过李广昌博士的修改充实，付梓出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提供了很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一部力作。读这部著作我能感受到激荡在作者胸中的百年风云，感受到担当在作者肩上的历史责任，感受到作者与民族同命运的情怀，感受到多年教学和科研所积累下的理论功底。

本书的立论和观点十分鲜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近百年历程中始终离不开一个支撑，就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当我们迷失了民族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奉若神明，看做不可置疑的绝对真理时，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遇到危机之时。当我们坚持民族主体性，清醒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之时。作者具有的广阔的历史视野和理论视野，使其能从佛教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古今两大文化事件的结合中有说服力地阐释这一论点。表面上看，似乎这一论点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其实不然，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释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500 年来，人类主要产生了两大思想体系。首先是在市场经济

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基础上产生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体系。这是近代以来由笛卡尔、洛克、卢梭、康德、斯密等伟大思想家共同努力而创立的，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实现的最高成果。当代资产阶级理论家包括新自由主义者之流，已经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古典时期所实现的原创性理论成就，在整个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中，不过是些二流角色。古典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是真诚的，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但是，马克思以后的当代西方理论家则是虚伪的，他们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修修补补，已经丧失了人类历史进步所赋予他们先辈的历史正义性，丧失了历史的道德依据。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是历史的，有局限性的。其次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中诞生的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马克思继承了近代以来的思想成果又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把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从形式深入到内容，从表层深入到实质，提出了克服异化，把人从现有的社会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人，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伟大理想。马克思是对近代伟大思想家的真正继承，是一种扬弃，唯因如此，马克思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千年伟人，直至今日，在给人类提供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图景方面，在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给以深刻的认识和揭示方面，没有人超过马克思。在马克思的光辉之下，现代西方理论家只是一些短暂地发出一缕微光的秋虫。

正因为马克思理论的伟大，所以，20世纪初选择了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共产党集中和吸引了中华民族中最杰出的精英，做出了可歌可泣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而且，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坚持马克思的理论和理想，在改革开放事业中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前列，保持着执政党的先进性。马克思的理论推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扬弃，所以，坚持马克思的理想，就包含着吸收资产阶级所达到的优秀思想成果，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理论不是与资产阶级体系无关而又对立的，恰恰是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继承和超越。所以，当代西方理论家们对中



国社会主义实践说三道四，特别是在政治上指手画脚，我们大可不必太在意，莫让其干扰了我们的事业。他们已经拿不出什么新东西，不过是为维护其利益而重复其传统意识形态而已。

马克思的理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怎样对待马克思的理论，同时就怎样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本书第一章中，作者指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30年代王明时期这段时间里，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共产党人内部，几乎没有人怀疑自己是否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王明以他所理解的列宁理论来衡量红军的革命实践时，由此挑起了党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议并始终不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理由把自己称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而别人不是。每个国家、每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都应该具有从本国国情出发，独立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毛泽东从理论上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中对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态度，即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共同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带领红军进深山，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邓小平改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民族主体性”的伟大创举，共同的思考前提是民族的生活实践。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独特的，马克思没有想到他所倡导的革命会发生在一一个落后的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国，也不会想到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竟然在没有完成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条件下进行，恰恰是这种独特性，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前所未有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创造性的先进理论。这两位伟人给我们树立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榜样。

在历史上，从王明开始，曾经出现过许多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而且这些理论权威大多数都对别人挥舞大棒，指责别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但历史证明，这样的理论权威多数是教条主义者，被革命



实践淘汰的往往是他们。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伟大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取得了从未有过的丰硕成果，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以高清海先生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冲破了苏联式的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哲学做了创新性的阐释。在哲学界几乎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以联共（布）党史的提纲而形成的本体论性质的哲学教科书，不能代表马克思的哲学精神。高清海先生提出了马克思哲学是“实践思维方式”的哲学，他也因其对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性理解而成为20世纪后20年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然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成果却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科书中得到反映。新教科书对于30年来理论界取得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却固执地抱守着苏联30年代形成、50年代传到中国的东西。如果说有变化的话，只相当于一个人的化妆有了变化，人却依然旧我。

我国当前社会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社会在邓小平思想精神的指引下，从事着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先进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教育领域，却被最乏味最没有创造性的教条主义把持着。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环境下，许多大学都能够编写和使用自己的教科书，但是，目前中国的数千所大学照本宣科地使用着同一本教科书。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知，会作何感想？

应该坚信，马克思理论的彻底性征服人心，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的认同，充分发挥全民族的主体能动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种局面是仅靠那几个人编书所不能比的。

中国共产党人保存着马克思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伟大实践，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探索中，我们会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化，这是一种人类性的事业。

高文新

2009年11月6日于吉林大学东朝阳宿舍



导论 哲学与哲学的想象力

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不是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

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出时，意味着它已经把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事实”，以哲学的方式提升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哲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哲学历史的时空限定，使它不可避免地要以民族性的特点作为哲学的时代性特征。当哲学挟裹着民族在传统和现实中所形成的情感与欲望、理性和激情、认知及信仰等等复杂的内容提升时代精神时，它的“视界”就一定溶涵着这个民族所渴求的“世界”，它所建树的理论，就首先应当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表征。于是，在历史和现实的接续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经验性的、历史性的和知识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印记的现代中国哲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程固然是在中华民族的实践中展开的，但是这种实践的哲学意义，却在于它在以传统的基因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铸成了一个民族的心智品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

哲学想象力是哲学的一种能力。与思想的其他能力比较起来，想象力固然有着康德或海德格尔所表述的“不在场”特征，但这种不在场却来自于在场的人的想象。因此，哲学想象力既不是像康德那样为寻求先验合理性而创造的一种理性回溯能力，也不是



像海德格尔那样，为了张扬不在场的意义而竭力摆脱在场缠绕的能力。哲学的想象力，是现实的人以在场的方式收敛所有不在场的思想能力，它不是所谓在场或不在场的分界，而是它的有效链接。正是有了这种哲学的想象力，感性的、现实的人才有了以在场的形式超越感性和现实的规定，寻求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可能。

哲学想象力首先以理性自觉的方式区别于生活中的常识性的想象力。它不仅以对“不在场”的渴求张扬了人超越现实的种种理念，而且在人对人的现实的自我观照中，开启了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多重规定，并且在力图改变现有的意义和价值规定中，实现人的升华。哲学想象力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精致的或素朴的、逻辑的或生活的、经验的或先验的表达方式，而在于人类利用自身所具有的这种独特能力创造了怎样的思想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中形成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想象如何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和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了能够化为理想的可能。哲学的想象力同样有别于科学的想象力。科学的想象力以必然性的寻求来构建人或自然“规律”的逻辑之路。为寻求某种规律，科学总要在时间之桥上割去许多不在场的东西，它把规律的认知与提取浓缩为当下可捡拾的一切，并且在这种捡拾中，以“走向光明”的宏大叙事方式鼓舞着自身、鼓舞着人类。然而，人类及其社会的不可穷尽性，并不总是以在场的方式显现自身的。现实的功利追求替代不了精神家园的渴望，在场的与不在场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在时间的不同轴向上，把人的存在意义和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即隐蔽其后不在场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展现出来，并且在时间和历史的迁移中，不断改变着这些意义的内容及其表述方式。这意味着，在场的人不仅要以科学的方式通过我们所期盼的“必然”去创造人的生存条件，而且需要在超越在场的“想象”中，以哲学的方式寻觅人的生存境界。和科学所遵循的进步或进化理念不同，哲学是以批判甚至摧毁旧有理论的方式继承以往的思想成就，因而它往往是在“无路可走”的彷徨、迷惘和失落境遇中，在没有固定路径和确定范围的思想中，展开它源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的想象力。借用福柯的话说，这种想象力是“思想用以向他自己施



加压力的批评工作”，它不会拘泥于“为早已知道的东西寻找理由”，而是要“努力弄清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①。张世英先生说，“想象让我们拓展一切可能的东西的疆界，他让我们伸展到自身之外，甚至伸展到一切存在的东西之外”^②。“正是逻辑思维走到头时，想象为我们展开一个全新的视域，教人超出概括性和同一性的界限，而让我们飞翔到尚未概括的可能。”^③

逻辑的终点正是想象的起点，“识”的极限是“觉”的开端。当马克思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把对世界的解说诉之于世界的改造时，现实的生活世界就不再滞留于抽象思维概念王国的阴影之中。这样，哲学对现实世界的体悟就不能仅仅归结为“认识”，它的更深层意蕴在于通过内在的体验和自身的参与，完成对时代精神的萃取。王阳明说：“大人能以万物为一体。”^④这是一种主体境界的追求，它不是抛却了知识或认识，而是超越了知识和认识。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来说，这是一种力求达到澄明之境的“觉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确立自身主体性的历史，而它的现实，则是民族主体对自身内涵的时代觉解。民族主体性的觉解为中国当代哲学的想象力提供了它的时代载体，而力图走出传统知识论局限的当代中国哲学，也在这种觉解过程中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中国的“现实问题”，而是现实中国的“哲学问题”。当我们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理由把这一问题置于哲学想象力的平台时，已经在民族主体性的现代觉解中，给出了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期待。后者又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和在何种程度上提升我们的想象能力，放飞哲学的想象。

^① 参见福柯《性史》，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② 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6页。

^③ 同上书，第108页。

^④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大学问》。



一 哲学想象力：走出知识论困境的努力

西方哲学早在古希腊阶段就开始了用哲学语句描述想象的历史。但是，“想象力”的哲学开端却不是来自于对想象的肯定，而是来自对它的贬低甚至否定。由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历史中，想象力在西方哲学中经历了被漠视、被遗弃、被重视、被重新理解的排列语序，它的哲学境遇从某个方面反映了西方哲学不同阶段的认识水平，而关于这种变化的反思，应当有助于我们在当代意义上理解哲学与哲学想象力的关系。

海德格尔把西方传统哲学称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它的表现是把“存在”理解为“现实”的“在者”，用“存在者”遮蔽了“存在”本身。因此它的实质是通过对在场性的单一强调而忽略了“存在”的不在场性，由此导致了对“存在”的遗忘。“想象”是关于不在场的一种思想行为，而想象力则是形成想象的能力，用康德的话说，“想象力是即便对象不在场也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力”^①。显然，在哲学形成的初始阶段，无论是人类精神早期对哲学所寄予的厚望，还是这个时期人类对现实在场的急切求解心态，都表明以“不在场”为标志的想象和想象力，不可能受到哲学的青睐。因此，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近代休谟以前的哲学，尽管也有诸如亚里士多德等关于想象力的零散赞许观点，但从总体上说，想象力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中还是屡遭贬斥的。想象力的这种哲学境遇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种境遇来自于想象本身。“想象”这一特殊的精神现象不同于其他的认知和思想行为。它的“不在场”特征使任何一个生活于现实之中的人都不会把它“当真”，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想象”总是被等同于幻想、虚构、臆想等人类心灵中消极的东西。当人们习惯于把现实的“在场”理解为唯一真实的东西时，想象往往被斥之为虚构或荒谬之物。弗朗西兹·培根甚至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把想象当作巫术和迷信，在他看来，“迷信以及神学之糅入哲学，这对哲学的败坏作用则远更广泛，而且有着最大的危害，不论对于整个体系或者对于体系的各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因为人类理解力之易为想象的势力所侵袭正不亚于其易为普通概念的势力所侵袭”^①。尽管人可以尽情地想象，但是理性和理智对想象的防范是获得真正的认识的必要前提。产生想象的想象力，也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解释中被理解为胡思乱想的根源。

第二，柏拉图所缔造的理性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把想象力作为一个有碍于哲学理性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加以排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想象、信仰、思维、理智四个等级，其中想象是最低级的认识能力。他在著名的“洞穴之喻”和“线喻”中，都曾用嘲讽的语调调侃过想象这种低级的认识能力。由柏拉图开始的西方传统哲学，在千年历史中继承了理性传统，也同样继承了他关于想象力的这种观点。由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哲学放大了人的理性陋习，他们把“在场”理解为唯一的。而实际上，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种“在场”都永远是暂时的、局部的和瞬间即逝的。真正支持在场的，一定是那些在空间上包含着在场，在时间上溶涵着“曾在”和“将在”的不在场的内容。为传统哲学所抛弃的想象力，就是这样一种不在场。郑晰先生就曾说过，“实在的思维，都有个对象，然此对象，不一定是实在的对象。对象可以是实在的，却不一定就是实在的，同时又都不只是思维的内容。我们应该注意这非实在的意义”^②。为后来哲学家们所反思的这些问题，构成了传统哲学排斥想象力的第二个缘由。

第三，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和启蒙运动，在理性的大旗下进一步湮没了想象力的哲学方向。西方近代哲学通过上帝自然化和上帝人化的手段完成了中世纪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换，它在尊重人的固有的理性能力旗号下，以主体与客体、心与物之间相互明

^① 弗·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页。

^② 郑晰：《康德学述》，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5页。



确区分为前提，以获得完整可靠的知识体系为目的，展开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认识论转向”。在这种以人的理性克服神性，以知识的求真取代本体追问的转向中，理性得到了充分彰显，而不在场的意识，尤其是人的想象力却作为理性的对立面，遭到了极度的贬低。无论是在唯理论还是经验论的立场上，理性都被认作知识的唯一表征。笛卡尔认为，想象这种思维“对我的精神本质，决不是必要的；因为，既使我没有这种想象的能力，无疑我仍然会和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从而可以断言，它并不取决于我的精神，而是取决于不同于我的精神的别的什么东西。”^①因此，想象不过是对“物”的外在感知形式，它不会获得真正的知识。同样，经验论的代表洛克也把想象与猜测、信仰等同起来，并认为想象不可能获得知识。“所谓知识不是别的，只是人心对任何观念间的联络和契合，或矛盾和相违而生的一种知觉。知识只成立于这种知觉。已有这种知觉，就有知识，没有这种知觉，则我们只可以想象、猜度或信仰，而却不能达到什么知识。”^②在近代启蒙主义者们关于理性能力的高度期待中，已经把理性能力获得的知识看作理想的知识，甚至把建立在理性原则上的社会当作理想的社会。这样，在近代哲学理性主义关于理性的绝对推崇下，想象力和其他不在场的意识均遭到了被抛弃的命运。

理性主义在理性的追求中遇到了知识论自身的困境。它无法说明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概念知识如何统摄在场的个别，也无法解释有限的存在者如何获得应当具有无限意义的概念知识。于是，在力求走出知识论困境的西方哲学，开始把以“不在场”为特质的想象力，纳入哲学的视域。

休谟应当是第一个重新估量哲学想象力的近代哲学家。休谟在以他尖锐的问题刻画了理性主义的荒谬时，第一次把想象作为人类一切知识的基础：“记忆、感官和知性都是建立在想象和观念的

①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7页。

② 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15页。



活泼性上面的”^①，而现实中那些“臆想的想象”，正是那些竭力贬低想象的理性主义者们的所为，如因果性、必然性这些概念，无一不是理性主义臆想的结果。以想象作为武器，休谟打破了自柏拉图以来关于想象的旧哲学观点，也为哲学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平台。康德哲学，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完成了其在哲学发展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先验想象力理论的构造。

康德哲学关于想象力的研究集中在他的哲学批判时期。尽管康德哲学本身仍然缠绵于知识论的语言系统，但是，他关于想象力的论述却是力求摆脱传统西方知识论困境的一种努力。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把先验想象力和审美想象力作为认知理性和审美理性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得出“可能的认知”与“审美价值”是如何形成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康德对想象力的研究积蓄了包括休谟在内的以往哲学想象力理论的基本内容，又引发了后继者关于想象力的进一步研究。从对后世哲学想象力问题研究的影响来看，康德的想象力理论的贡献在于，第一，他第一次把作为哲学想象力的纯粹想象力视为“人类心灵基本能力”^②。在对诸如幻想、梦想等能够引起想象力问题歧义的内容进行了哲学上的分辨以后，康德开始把想象力作为知识论的基础，并且把它作为解决传统哲学所遇到的知识论难题的有效手段。第二，康德第一次明确划分了哲学的经验想象力和先验想象力，并且在带有浓郁的西方理性主义色彩的传统思维习惯支配下，规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康德哲学中，先验想象力是与经验想象力对应的一种能力，它是经验想象力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它不仅能够生产经验想象，而且能够规范经验想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就曾说：“由于想象力是自发的，所以我有时把它叫作生产想象力，由此把它与再生的想象力区分开来，后者的综合知识服从经验性的规定，即联想的规律。”^③ 我们知

^① 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页。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③ 同上书，第129页。



道，康德的先验想象力说是在回答自然科学之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服务于纯粹概念的先验演绎，而实质则是解决直观和概念的先天综合问题。由于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先验演绎的成败，而后者又决定着批判任务的最终完成，因而，先验想象力在康德的批判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先验想象力甚至成了哲学想象力的代名词。第三，先验想象力之所以被提高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要解决感性直观和理性之间的勾连问题。休谟的著名问题所引发的康德式思考的结果，是以先验想象力的设置来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实现人为自然立法的最终目的。于是，康德以他著名的“先验图式”把先验想象力视为一种居于感性和知性、直观和概念之间的能力，由于它的沟通作用，知性概念被用于先天直观，由此构成我们的先天综合判断。在这里，先验想象力的综合一般被理解为一种规则的综合。借助于这种能力，主体把感性杂多和纯粹统觉结合起来。由此可以看出在康德及其后西方哲学中关于想象力的一个特点，即把想象力作为认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个认识由此及彼的必要过渡形式。

康德为想象力嵌入了逻辑的内容，固然使想象力有了较为明确的哲学规定，但是也恰恰是由于逻辑的规定限制了哲学想象进一步展开的可能。康德以知识论的方法力图走出知识论困境的努力，并没有使哲学真正从知识论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是他关于提升哲学想象力以弥合主体和客体之间断裂的尝试，却极大地鼓舞了后世哲学。从康德哲学开始，想象力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而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心理过程了。尽管康德的先验想象力仍然停留在知识论的领域内，但他所给出的先验范畴已经预示着在场形而上学将走向末路^①。现代西方哲学已经充分意识到知识论在场形式的局限性，因此都把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作为走出知识论困境的必由之路。他们不仅把在场的形而上学作为人类认知水平

^① 雷振鹏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走出知识论的困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曾对此做出较为独到的分析。

